

# 推进金融改革创新“六策”



王利博制图

周德文

小微企业就单个企业而言是弱者，但它是一个庞大的群体，与就业、经济增长和社会稳定息息相关。有数据显示，经工商登记注册的小微企业有1023万户，占中国企业总数的99%，提供了85%的城乡就业岗位，最终产品和服务占国内生产总值的60%，上缴税收占全国企业的54.3%。可见，小微企业在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中占有重要地位，是支撑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基石，是推动产业结构升级的底层力量。

## “六把刀”和“一根绳”困扰小微企业

小微企业的生存与发展目前面临前所未有的困难。有“六把刀一根绳子”架在小微企业的脖子上。“六把刀”是指：国内外市场环境变化，经济增长速度减缓；企业用工成本增加，特别是劳动力成本上升；原材料成本上涨；企业用地，特别是小型企业微型企业的用地比较紧张；人民币汇率提高；节能减排压力比较大。“一根绳”就是指银行信贷收紧。在“六把刀一根绳”中，银行信贷这根“绳子”是最要小微企业命的。

由于我国现行的金融体制、金融机构缺乏与小微企业需求相适应的融资渠道、融资体系，加上2010年以来，随着稳健货币政策的实施，银行信贷步步收紧，小微企业更是望兴叹，无奈之下更多地转向民间借贷，民间借

贷的利率急速提高。融资难、融资贵，致小微企业于窒息境地。2011年局部地区爆发的金融风波，导致部分企业大多为小微企业资金链断裂，企业主“跑路”，对企业家信心和社会信用环境造成了很坏的影响。

小微企业融资难、融资贵原因是多方面的：我国的金融体系尚不健全，大型银行主导的金融机构体系与小微企业的金融需求不匹配；地方银行机构规模小，难以满足小微企业巨大的融资需求；新型金融组织如小额贷款公司、村镇银行、股权投资机构数量少，服务覆盖面、影响力有限；民间融资受金融体制的影响处于灰色状态；小微企业自身的弱质性；产业层次低，管理水平落后，财务制度不健全，抵押担保物缺乏，信用记录缺失等因素，使小微企业在大型银行主导的融资体系中明显处于不利地位。

## 破解小微企业融资难根本出路是金融改革创新

因此，破解小微企业融资难题，根本出路在于大力推进金融改革创新，笔者认为，应主要从以下“六策”着手。

首先，建立健全面向小微企业的金融服务体系。鼓励国有银行和股份制商业银行发挥融资主渠道作用，坚持国有金融组织与民间金融组织、银行与非银行金融机构、内资与外资金融机构、本地与外地金融机构同步发展，实行分类考核，推动全国性逐步形成多层次、广覆盖、互为补充良性竞争的小微企业金融服务体系。

其次，稳步推进小额贷款公司等新型金融组织发展。要进一步放宽小额贷款公司门槛，通过统筹规划布局，引入招标投标竞争机制、鼓励增资扩股、探索小额贷款公司与国有大型银行合作开展中小企业专营业务、开展小额贷款公司资产证券化试点等措施，做大做强小额贷款公司。要积极开展符合条件的民企、自然人根据有关规定发起设立村镇银行、社区银行、农村资金互助社、贷款公司等试点，经营良好的小额贷款公司允许其改制为村镇银行。

再次，大力推动金融产品和服务方式创新。引导和鼓励银行机构围绕小微企业贷款方式、抵质押担保方式、还款方式以及信贷流程改进，积极开展产品和服务创新。着力推进动产、应收账款、仓单、股权、知识产权、商位使用权、农民住房、土地承包经营权、排污权等抵质押方式。积极推广供应链融资、物流融资、“小本贷款”、小企业债权集合信托、“创业通”、“速贷通”、“保兑仓融资”、循环贷款等多种信贷创新产品。大力推广“抱团增信”、“网络联保”、“桥隧模式”、“信贷工厂”等多种金融服务模式，更好地满足小微企业多样化资金需求。

第四，进一步落实小微企业信贷差异化监管政策。引导和督促银行业金融机构进一步落实“四个差异化”监管措施，即在授权授信、利率定价、绩效考核、对不良贷款容忍度等四个方面给予小微企业政策倾斜。加快小微企业专营机构建设，进一步发挥现有小企业信贷专营机

构的作用，对符合条件的银行机构，支持批量设立专门从事小微企业和“三农”贷款的支行和专营机构，对专营机构实行差异化考核。鼓励银行机构进一步下放经营权限、缩短审批流程，提高小微企业金融服务效率。将小微企业金融服务纳入监管评级，通过调整相应指标权重，把银行业金融机构信贷投向引向小微企业。

第五，提升为小微企业金融综合服务的水平。探索建立小微企业综合融资服务平台，支持组建小微企业融资综合服务中心，集聚银行、担保、会计法律、评估、咨询、协会等机构，提供信用调查、资产评估、法律咨询等专业化服务。

第六，加强民间融资引导规范，维护经济金融稳定。开展规范民间融资试点，积极探索民间融资阳光化途径。以温州金融综合改革试验区建设为契机，对现有的各类民间融资方式进行规范，逐步形成一整套制度，作为民间融资相关行为的指导依据。同时要加强对创新型地方金融组织的管理，重点加强对融资性担保公司、典当行、寄售行、调剂行、投资机构以及网络贷款服务机构等市场主体的管理，积极防范化解民间融资及企业资金链断裂的风险。要建立健全民间融资监测体系，做好民间融资动态跟踪和风险预警。要严厉打击金融传销、非法集资、地下钱庄等非法金融活动及暴力讨债的黑恶势力，维护经济金融稳定发展。

（作者系温州中小企业发展促进会会长）

# 莫让涨工资成为“数字游戏”

在目前工资体制下，无论是提高最低收入标准和调整企业工资指导线，可能都无法改变中国劳动收入分配严重不公的问题，工薪阶层的生活状况也无法改善。

丁是钉

从名义上看，工薪阶层又要加工资了。两条官方消息互相辅证这样一个预期：

截至6月19日，中国已有10个省市发布2012年的企业工资指导线，工资增长幅度的基准线大多在14%左右。截至6月21日，全国已有15个省市在2012年调整了最低工资标准。

无论是最低工资标准的提高，还是工资指导线的上调，传达出的信号都给了工薪阶层更多的期望。在物价一个劲疯涨的时期，无论是从提高生活质量还是维持原有生活水平的角度，老百姓都期待着收入水平的提高。

但是，在目前的工资分配体制下，最低工资标准的提高真会让工薪阶层的生活状况有所改善吗？真实的答案是：很难。

以往的事实表明，每一次给低收入群体增加工资，都会引发工资的轮番上涨。并且，公务员和垄断性国企员工的工资增长水平，无论是从绝对数值上还是从比例上，都会超过低收入群体的工资增长幅度，由此导致收入分配差距被进一步拉大。

北京市统计局、国家统计局北京调查总队在北京2008年联合发布统计数据显示，1993年至2007年，北京市各行业在岗职工平均工资增速差异明显，2004—2007年，最高与最低行业职工平均工资差距在5.5—6倍。其中，2003—2007年，在岗职工平均工资年均增速最高的行业是金融业，为20.8%，增速最低的行业是居民服务和其他服务业，为7.5%。

同时，由于工资的普涨会带来成本推动型的通货膨胀，这样一来，低收入群体增加的工资就完全被物价上涨给吞噬掉了。最终的结果是，每当物价上涨，最低收入群体就寄希望于涨工资，但每次工资上涨，都会让其被固化在收入结构金字塔的最底层。

从名义上看，中国的最低工资标准提升在全球范围内都是很快的，但这种方式非但没有解决中国收入分配不公的问题，反而使这一问题持续恶化。（2009年中国统计年鉴）相关数据显示，2008年畜牧业职工平均工资为10803元，证券业为172123元，二者相差15.93倍。另外，有公开资料显示，石油、电力、电信、烟草等行业的职工人数不到全国职工人数的8%，但其收入相当于全国职工工资总额的60%左右。

中国所谓的和国际接轨，很多是学习美国的做法。就最低工资标准的调整而言，和中国相比，其调整的频度和幅度都远没有中国高，从1997年到2007年的十年间，美国的最低工资标准只提高了一次。同时，美国的最低工资标准并不是单纯提高，有时甚至会降低，比如在1970年至1981年间，其实际最低小时工资一直维持在8美元以上，但在1981年到1990年的9年间，实际最低小时工资却降低到了6.33美元。

与此相对应的是，在对待金融高管薪酬过高的问题上，美国和日本的做法是高度一致的，那就是制定法案要求降低金融高管的薪酬，而不是通过增加其他行业人员的工资水平来解决这一收入分配不公问题。这样就不会导致通货膨胀的恶果。

中国收入分配不公问题解决的难点在于，有关管理层不敢向高收入群体开刀，不敢触及高收入群体的利益，而是通过提高最低工资标准的办法，讨好低收入群体，但由此带来的一个严重负效应就是工资和物价的轮番上涨。在名义收入提高的背后，是工薪阶层苦苦积累的财富大幅度缩水甚至化为乌有的现实。在上世纪80年代，万元户还是令很多人望尘莫及的财富标准，但现在在的中年人都不知道100万元的积蓄能不能够自己养老。货币的大幅度增加以及由此带来的购买力下降，让许多人失去了幸福感甚至安全感，几乎所有的人都陷入对财富的疯狂追逐之中。

基尼系数是用来衡量居民内部收入分配差异的一个重要指标。国际上通常把0.4作为收入分配差距的“警戒线”，根据黄金分割律，其准确值应为0.382。一般发达国家的基尼指数在0.24到0.36之间，美国偏高，为0.4。中国大陆基尼系数2010年超过0.5，已跨入收入差距悬殊行列，财富分配非常不均。

比基尼系数所反映的贫富差异更严重的问题是，基尼系数中包含了最高收入阶层和最低收入阶层的财富占有情况，这使得劳动收入不公的问题被隐性化了。

我们可以尝试着问这样一个问题：如果你是一个工薪阶层，你会和一个亿万富翁去比较收入和生活差距吗？

亿万富翁的财富再多，他们在中国也是极少数人，很少有老百姓会和他们的收入水平及生活方式进行比较。低收入阶层最直接的公平感其实是来自于劳动收入的分配差距。

事实上，靠资本等其他要素获得财富的人毕竟是少数，在收入分配问题上并不具有代表性，绝大多数人是通过劳动来获取报酬，所以说，劳动报酬分配不公平是最大、最显性的不公平。如果这样的表述还不够明白，我们可以做一个推论：如果在一个社会中有极少数人富及极少数人穷，形成两极分化，这并不是一个大问题；最恶劣的问题是，在一个社会上一半人的生活显著好于另外一半人，形成两个阶层的分化。劳动收入分配不公所造成的正是这样一种事实。

在理想状态下，不同人在智力、体力、劳动强度和努力程度相同情况下，从事不同劳动所获得的收入应当大体是相当的。但在中国，同样一个人，由于进入了不同的行业，其收入水平是大大不相同的。更为严重的是，那些高收入行业的人员流动并非市场性的，通常是靠继承或裙带关系才能进入，这是极大的不公平。

从全球范围来看，在大部分市场经济国家中，行业收入差距远没有中国这样大。根据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国际劳工保障研究所提供的资料，2006—2007年最高和最低行业工资差距，日本、英国、法国约为1.6—2倍左右，德国、加拿大、美国、韩国在2.3—3倍之间。而这些国家的行业收入分配差距相比，中国15倍的细分行业收入分配差距是令人震惊的。

无论是提高最低收入标准和调整企业工资指导线，都无法改变中国劳动收入分配严重不公的问题。最有利于可持续发展的办法是，要敢于把政府人员和垄断行业的高工资降下来。只有这样才能够避免通货膨胀所引发的货币贬值，让老百姓多年积累的财富不致严重缩水，提高公民靠劳动创造财富的积极性和安全感，并使中国经济保证持续稳定的增长。

之所以中国的工资差距远高于市场化国家，其根本性的原因在于，劳动力配置和收入分配体制都还没有实现市场化。以中央企业为例，央企中大量劳务派遣工的存在，充分说明了体制内员工的高收入并不是其市场价值的体现，央企员工的合理收入应当以劳务派遣工的收入为参照系。

从根本上讲，要实现工资分配的公平，必须首先打破不同体制和行业间的人才壁垒，发挥市场在劳动力资源配置上的基础性作用。只要人力资源配置和工资分配的双轨制依然存在，工资越涨越穷的现象就无法破解。

# 银行变相收费何以“理直气壮”

孟书强

贷款利率下调、存款利率上浮，央行6月8日启动的“非对称降息”，让外界对银行的未来收益捏了把汗，坊间纷纷议论这一新政可能导致商业银行“损失近千亿”，银行业超高利润的局面可能会得到一定程度抑制。但银行显然比人们想象的要淡定得多。所谓墙内损失墙外补，银行准备用名目繁多的收费项目来维持“非对称降息”造成的损失。

## 银行业变相收费再起波澜

根据《第一财经日报》日前的报道，央行本意为利率市场化探路的“非对称性降息”，到了银行这里却变成了如何以更大的力度来稳存款。稳存款背后则是名目繁多的收费项目，因为存款才是收费增长的基础。

无独有偶，《经济观察报》的一则报道同样把矛头指向银行的收费项目。《经济观察报》的报道显示，今年1—4月份全国70余家大中型钢铁企业利润总额仅为11亿元。而这些钢厂同期的贷款利率、“贷款顾问费”、水利建设基金等各种财务费用总额，财务费用同比上涨了将近40%。武钢集团新闻发言人白方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融资贵、财务费用高，对于钢铁企业来说已经是一个普遍现象。遭受同样命运的还有石化行业。报道显示，今年3月份，国有石化企业资产负债率为59.10%，销售利润率为3.21%，财务费用则同比大幅

上涨了34.69%。

2011年中国银行业协会的数据显示，银行业各类服务项目共计1076项，其中收费项目850项。一度引起人们对银行业的尖锐批评和指责。面对汹涌而来的舆论压力，监管部门今年2月专门出台了《商业银行服务价格管理办法》，来严控银行收费行为。但是随着央行利率新政的出台，银行变相收费的冲动似乎再次变得“势不可挡”，攫住葫芦起来瓢，为了保住高额的利润，银行业似乎准备要把所有的损失从各种收费项目中再找回来。

## 银行业不能形成收费依赖

各种名目的收费一直是银行业维持高利润的一大保证。根据12家上市银行的2011年半年报，手续费及佣金净收入占到了其净利润的半壁江山。而收费项目在近7年时间里更是增加了10倍之多。换言之，银行业的高利润并非源自其自身的高水平经营管理，而是源自其垄断地位下得天独厚的政策优势以及建立在这种优势上的名目繁多的收费项目。

弄明白这个，就不难理解银行为什么在“非对称降息”后开始疯狂揽储了。其最重要的原因就是，有更多存款，才有更多收费，有更多收费，才能维持高额利润。

疯狂收费实际在一定程度上显示出银行业盈利能力的缺失。一般来说，决定银行盈利水平的因素主要有

规模、息差水平、中间业务收入、成本收入比和信贷成本。比较中西商业银行的盈利模式，可以发现和较为成熟的西方商业银行相比，我国商业银行盈利仍主要靠利差和收费，在中间业务上发展缓慢，而中间业务早已是西方商业银行的一大赢利点。在某种意义上来说，我国商业银行有必要摆脱一贯高利差和高收费的盈利模式，积极发展中间业务。这既是和国际同行竞争的需要，也是维护我国实体经济产业发展的需要。

## 变相收费是杀鸡取卵的短视行为

如此之高的收费项目让宝钢、武钢和石化这样的大型国企都感受到了生存的危机，难怪中钢协副秘书长屈秀丽在接受媒体采访时感慨，中国钢厂不仅在为海外矿山打工，而且还在为国内商业银行打工。财大气粗的大型国企尚且如此，中小企业的状况可想而知。

融资难、融资贵的问题一直是困扰中小企业生存和发展的一大难题，国家层面也屡出新政试图缓和中小企业的生存危机。如今，大型国企也开始遭遇融资难、融资贵的问题，这不能不让人感叹银行业的“唯利是图”。

作为迄今为止最有效的经济组织形式，企业的出现被称作是“人类的成就”，尤其是股份制企业惊人的崛起和当前无可争辩的统治性地位，被公认为是现代历史中最引人注目

的现象之一。企业的发展关系着国家命脉、关系着社会稳定、关系着千千万万个就业，更关系着千万个就业岗位背后的亿万个家庭。

当前国际经济走势普遍低迷，国内经济下行的压力不断加大。温家宝总理多次提出要把稳增长放在更加重要的位置。而企业正是维持稳增长最为重要的载体之一。没有企业尤其是实体企业的稳定发展，国家经济的稳增长只能变为一句空话。

从去年开始就已经凸显出来的实体经济空心化的状况尚未得到改善。此时，银行业各种名目繁多的收费项目对本来就生存困难的实体经济来说，无疑是雪上加霜。反过来，对银行来说，企业如果由于各种名目繁多的银行收费而不敢融资，承担不起融资的成本，就极有可能被倒逼关门。没有企业，不要说各种名目的收费项目，银行的生存恐怕也是问题。因此，从长远来看，银行业在此时对各类企业变相收费，说直接就是一种杀鸡取卵的短视行为。银行业和实体经济企业大多时候是相辅相成而存在的，且不能为了短期利益，而置对方的命运于不顾，如此，最终反而也会害了自己。

最新传出的一个好消息是，国家发改委价格检查与反垄断局将配合国务院即将出台的降低钢铁和石化财务费用成本的措施，采取开展银行收费专项检查、规范银行收费等措施，减轻企业融资负担。但愿这能缓解已经陷入困境中的各类企业的生存和发展危机。